



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张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洪晓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一. 引言

根据“特快列车 (Express train)”理论,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出现是在中国大陆农业迅速南传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了分布于东南亚岛屿地区最早的南岛语族 (Austronesian) 的形成和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地区南亚语族 (Austroasiatic) 的形成。“特快列车”理论认为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最早的来源很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在史前的特定阶段通过东南福建、台湾、华南和西南向这些地区传播。由于中国大陆南方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或扩展的基地应当是华南和西南地区,因而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出现和发展遂成为上述立论中的关键问题。目前,稻作农业最早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线索已经比较明确,但在岭南——福建和西南地区出现的时间却还存在不同说法,涉及的问题既有稻作证据不够充足也有已有证据年代学方面研究不够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华南和西南地区稻作农业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而来在目前已经成为共识,而传播过去的时间和地点很可能不是一次性和单一性的。稻作农业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出现和成长过程或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在短期内解决。而稻作农业的发展继而向东南亚地区扩展也是要有条件的,这就是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农业文化要发达一定程度并有向外扩展的动力和要求,这个问题还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必须联系起来考虑。本文将对相关问题的初步讨论。

二. 广东及闽台地区早期农业的证据

由于近年来学界对农业考古日趋重视,福建、华南和西南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有关稻作农业的新证据,目前见于报导年代最早的都集中在福建、台湾和广东地区。

其中广东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于石峡遗址下层和中层都出土了大量的稻谷和水稻茎秆,经鉴定为栽培稻,年代属于石峡文化,是当时我们知道岭南地区年代最早并且可以确定的稻作农业遗存。近年来新发现的早期稻作遗存证据有四处。一是粤北曲江石峡遗址下文化层,二是环珠江口地区香港西贡沙下遗址,三是西江下游高明的古椰遗址,四是粤西西江流域封开杏花河遗址。

据有关研究者报导,1985 年发掘的石峡下文化层出土有稻谷遗存,但还没有详细资料发表。石峡下文化层出土遗存一般称为“前石峡文化”或“石峡一期文化”。这一文化堆积由于层位在石峡文化遗存之下,所以年代较石峡文化为早固然无疑,但究竟早到何时却没有一定的说法。一种观点推定石峡一期文化年代很早,认为大致与汤家岗文化年代相当(绝对年代可达距今 6800 年),也就是说与珠江口地区咸头岭文化最早阶段同时或还要早。另一种观点认为石峡一期年代比咸头岭彩陶白陶遗存晚,与草堂湾一期、深湾 f 层年代相当。石峡一期文化的陶器主要绳纹和细绳纹折沿釜、直领罐,领和肩部饰有刻划纹、篦点纹、小圆圈纹和指甲纹,敛口圈足盘圈足部位多饰圆镂孔和小圆圈纹,没有彩陶也没有印纹硬陶,确实与草堂湾一期和深湾 f 层的陶器

^{*} 本文为提交“文物保护与南中国史前考古国际研讨会”(2007 年 12 月,香港)的会议论文。

特征很相近。即便是很多将这一类遗存归为大湾文化或咸头岭文化的研究者也认为应当属于该文化的最晚阶段。而深湾 f 层陶片热释光年代为 2900BC, 说明石峡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 5000 年前后。

沙下遗址在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堆积中出土稻米一粒, 还有大量水稻亚科和葫芦科植物硅酸体。沙下遗址 2002 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分为两期, 其中第一期的内容与东莞圆洲等遗址相近, 其年代已经是石峡文化时期, 在距今 4500 年前后。古椰出土水稻的标本数量比较多, 年代大致与沙下新石器时代同时。封开杏花河发现的水稻据说是石峡文化时期的^⑩。

过去所知福建最早的水稻出土见于昙石山文化^⑪。最新的一些发现仍未突破这个时期, 昙石山遗址第九次发掘在属于昙石山文化的堆积中发现了 2 粒稻谷^⑫, 对这次发掘采集的木炭标本测年校正数据为 BC2870~2340 年。年代稍晚的霞浦黄瓜遗址第二次发掘和明溪南山遗址也发现有水稻^⑬。

台湾发现最早的稻米的地点是台南的南关里和南关里东^⑭, 时代应属于大坌坑文化的晚期阶段, 年代经测定大致为距今 4700~4200 年, 这里也同时出土了粟和豆^⑮。到了距今 4200 年以后, 大量稻作农业的证据相继出土, 包括陶器上的稻米印痕或是直接的炭化稻谷证据, 地点涵盖澎湖的赤崁^⑯、台湾南部的垦丁^⑰和右先方^⑱、台湾北部的芝山岩^⑲以及台湾东部的长光^⑳等等。

可见, 东南沿海地区广东和福建、台湾的稻作农业出现的年代几乎是同时的, 大约都不超过距今 5000 年, 并在 4500 以后开始比较普遍。

三. 广西和西南地区早期农业的证据

广西地区稻作农业的研究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根据已经有的一些新的发现, 有些研究者认为农业在广西出现的时间在 6000 甚至 6500 年^㉑。然而详查发表的资料, 相关的证据都没有这样早。

广西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证据被认为是邕宁顶蛳山四期的水稻植硅石^㉒。顶蛳山遗址一至三期的年代都很早, 其中二、三两期属于所谓顶蛳山文化^㉓, 这三期的堆积物中都没有发现稻属植硅石, 但到第四期突然出现大量的稻属植硅石, 当然很可能与水稻的栽培有关。但顶蛳山四期并没有直接的测年, 需要与其它相关遗存进行对比。顶蛳山遗址所在的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为顶蛳山文化所分布, 新石

器时代晚期以降的文化编年还不是很清楚。顶蛳山四期遗存与顶蛳山文化相差甚远, 其陶器主要有夹炭陶和夹砂陶, 器类有高领罐、圜底罐、釜和杯等, 多饰绳纹, 在高领罐的颈部还饰有刻划的卷云纹等文饰。特征接近武鸣弄山岩洞穴墓葬的陶器, 如绳纹直领球腹罐、刻划卷云纹和陶杯等^㉔。岩洞葬在桂南延续的时间很长, 而弄山一般认为是其中年代最早的, 如韦江认为属于夏商时期^㉕, 发掘者则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亦即距今 4500~4000 年间^㉖。由于弄山岩洞葬中出土的几件“大石铲”与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所谓“大石铲”文化所见者并无二致, 因此后一种断代也是有理由的。总之弄山岩洞葬的年代应当在距今 4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后。顶蛳山四期遗存虽然与弄山岩陶器并不完全一样, 但时代也不会相差太远。

桂北资源县晓锦遗址已经接近湖南, 这里发掘的遗存被划分为三期, 其中第一期未发现农业迹象, 第二期则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㉗。由于同类遗存在当地发现不多, 桂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年代序列也未建立, 年代难以估计。就第一期中出现断面为菱形的石铲, 第二期出现断面为三角形的石铲来看, 第一期的年代应在屈家岭文化以后, 第二期则应在龙山时代的晚期以后。晓锦三期都有碳十四年代发表, 其中第一期 3 个年代分别为距今 3920 ± 140 (99ZXNT8^㉘)、 3620 ± 150 (99ZXNT8^㉙) 和 3890 ± 150 (01ZXWT2^㉚), 第二期 5 个年代分别为距今 3850 ± 140 (01ZXWT2^㉛)、 3420 ± 140 (01ZXWT2Y1)、 4030 ± 110 (99ZXST4^㉜)、 4700 ± 800 (99ZXNTT7^㉝) 和 4700 ± 200 (98ZXNT4^㉞)。显然其中有部分数据是与分期颠倒的。按原理早期的碳十四样本是有可能混入晚期的堆积中的, 堆积物年代应当与最晚的数据接近, 因此晓锦二期的年代校正后大致可能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

桂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在发掘遗存的第二期后段发现有炭化稻谷和粟^㉟。其中粟的碳十四测年为 3131 ± 50 (DY-D1015), 炭化稻的测年为 3463 ± 50 (DY-D1014) 和 2883 ± 50 (DY-D1013)。发掘简报通过陶器对比也认为第二期后段的年代接近商代晚期, 是大致不错的。

西南地区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应当是四川, 其中川西北早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从西北迁徙而来的马家窑文化人群^㊱, 最早年代大致在距今 5000 年左右, 推测应当带来了旱作农

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粟就是出现在这一条传播路线上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③。随后成都平原地区宝墩村文化的稻作农业则应当是从长江中游经过川东重庆地区传播而来。贵州目前所知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威宁鸡公山遗址出土的水稻,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④。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滇池附近的石寨山类型,曾经出土过水稻遗存,这个类型的海东遗址有一个碳十四资料发表,为距今 4235 ± 150 年^⑤。而有确切的稻作证据的宾川白羊村文化,碳十四年代为 $1820 \pm 85\text{BC}$ (校正为2190-1930BC)^⑥。其它如元谋大墩子等的年代就更晚了。

总之,目前所知广西和西南地区除四川农业出现可能稍早以外,其它如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最早的农业大致都出现在距今4500年之后新石器时代末期。

四. 华南、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

目前所知东南沿海、华南和西南最早的稻作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在这样广大的区域中,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出现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又不是处处都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福建和广东所在的东南地区,稻作农业大致出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另一个是广西和云贵地区,稻作农业大致出现在距今4500年以后。前一个年代大致相当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早期之交或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后一个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晚期以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东南沿海、华南和西南地区出现稻作农业的时间显然是比较晚的。当然,目前所知的证据并不一定就是最早的,考古发现总有可能把曾经是最早的东西不断地提到更早。因此,为了要说明这一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我们还需要观察在这之前上述地区的文化生态。

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来就可以分为福建广东(含沿海岛屿)与广西(含越南北部)两个大的区域^⑦,从很一开始这种区别就一直比较明显。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分布于广西地区的主要是本地原生的顶蛳山文化系列采集狩猎文化。这个文化目前发现的取食经济特征是所谓的采集渔猎,但特别依赖于河流的淡水生物,遗留下来的也都是贝丘遗址。陶器和石器的种类也很简单。顶蛳山文化是一支最早出

现于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比较集中地发现于桂南南宁地区周围左江、右江、邕江及其支流岸边,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邕宁顶蛳山^⑧、长塘、南宁豹子头^⑨、扶绥江西岸和敢造^⑩。年代比较晚的则逐渐分布于桂中、桂东和粤西的郁江、浔江、黔江和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在紧邻广西的越南北部地区清化(Thanh Hoa)省的贝丘遗址也是这一类遗存,不过被称为多笔(Da But)文化^⑪。经过发掘的有横县西津^⑫、秋江^⑬、江口^⑭、象山南沙湾^⑮和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⑯。其中横县的西津和秋江遗址文化面貌比较相近,而与另外彼此比较相近的江口、南沙湾、簕竹口的文化面貌不太一样。年代比较晚的南沙湾一期有4样本的测年,其中3个动物骨骼样本的年代分别为 $5390 \pm 260\text{BP}$ 、 $6070 \pm 130\text{BP}$ 、 $6580 \pm 150\text{BP}$,一个螺壳标本年代为 8740 ± 120 ,由于水生样本的年代可能会偏老,与动物骨骼的年代也许并不矛盾。因此,以南沙湾的年代来看,顶蛳山文化延续的最晚的年代大致应当在6000~5500年间。顶蛳山文化分布于生态环境适合于稻作农业成长的西江流域的大小支流,但并没有发现有稻作农业的遗存,顶蛳山遗址这个时期的堆积物中甚至连稻属植硅石都没有发现。这支文化虽也有不断扩张的倾向,但似乎与其它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没有太多的交流,长时期也鲜有文化的变化,自身难以演变为农业文化。

广东和福建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原生新石器时代文化。这里最早出现的是在环珠江口地区咸头岭文化,年代最早也许可达距今7000年,延续的时间大致到距今5500~5000年间。这个文化的器物已经比较复杂,经济形态还不清楚,但从分布在海岸沙堤的环境来看,应当是一支海洋性经济倾向的文化,不大可能有农业的内容甚至是需要。由于咸头岭文化与湖南的汤家岗——大溪文化十分相像,也有研究者认为应该是大溪文化的地方变体^⑰。但咸头岭文化显然不会直接来自两湖地区农业已经发达的腹心地带,而只能来自湖南南部南岭山地地区如高庙——松溪口——大溪文化系列。在距今6000年前后,两广沿海地区还有除咸头岭文化之外的其它一些遗存,如防城、钦州和潮安发现的十几处早期的贝丘遗址等,同样没有农业的信息,其来源虽然一时难以说清楚,但也应当是当地或邻近的南岭山地采集渔猎文化的变体。同样在这个时期,福建沿海和台湾也出现了当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这就是蚬丘头(富国墩)文化和大垵坑文化,蚬丘头(富国墩)文化和大垵坑文化的器物组合及特征与咸头岭文化或珠江三角州史前文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④,同时也有来自河姆渡文化的部分影响^⑤,但同样不会是直接来自河姆渡文化,而应当来自浙南闽北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的同时期新石器文化。总之,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邻近地区的采集渔猎文化。而南岭北侧山地靠近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实普遍存在有一些早期的新石器文化,如沅水中游地区的高庙——松溪口大溪文化系列,再如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系列等,也还应当有一些至今尚未发现或辨认出来的文化,它们应当是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文化很可能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文化如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但这些山地文化本身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稻作农业的迹象,高庙遗址屈家岭文化以前的文化堆积中就没有发现有稻属植硅石的存在^⑥。因此,它们迁徙至岭南也不会携带稻作农业的传统,更何况两广沿海地区最早出现的实际都是一些开发海洋资源的新石器文化。

可见,广东、福建最早开始出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外来的,与长江中下游南部山地文化地区有长期密切的联系,广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当地的,但与外面的文化联系甚少,构成了农业出现在或进入到岭南地区时的文化生态背景。这两种情况也许是造成广东——福建与广西两个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和来源有所不同的主要原因。相同的是这两个地区在早期新石器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都很可能没有本地原生的稻作农业经济,而只是有着不一样的采集渔猎取食形态。这种情况在闽粤地区一直延续到距今 5500~5000 年间,在广西则大致在 6000~5500 年间。

接下来是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衰落的一段时期,这段时间在福建正是蚬丘头文化与昙石山文化之间,而这两个文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后者由前者直接发展而来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的事情。在广东沿海地区早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现象^⑦。在广西,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数据提示我们可能存在有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但文化的面貌是一种什么样子还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岭南这种采集狩猎文化衰落的现象实际不仅仅局限在岭南,岭南邻近地区过去曾经繁荣的采集渔猎文化如沅水中游和峡江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其原因我们曾推测为气

候的变冷,但还不能肯定。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岭南地区在既无自己文化压力又无邻近文化刺激的情况下能够自己产生农业文化。故而岭南稻作农业必然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无可疑。

问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已经开始了农业化的进程,为何一定要迟到距今 5000 年间才传播到华南地区?这应当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农业形态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生业形态有关,也应当与当时该地区的文化生态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生业形态的材料并不充分,只是大概知道其中的农业成分并不占很大比例,在边缘地区很可能由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的高庙文化和峡江地区城背溪——大溪文化甚至可能放弃了已经开始的稻作传统。另一方面,彼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群聚落的扩展主要都是向流域腹心地区尚未开发的地区拓展。至距今 5000 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逐渐成为生计的主要来源,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区甚至可能出现了最早的犁耕农业,人口增长达到了十分密集的程度,社会和文化也发生剧烈的变化。而距今 5000 年前,正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晚期和中游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农业、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中下游之间的张四墩文化和樊城堆文化也开始逐渐扩张。同时期福建和广东地区的昙石山文化和石峡文化中多有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因素即是在长江中下游族群南迁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点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可为证明。闽粤早期的稻作农业也应该是在这期间开始出现的。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向南扩展到原来曾是采集渔猎文化的沅水中游地区和峡江地区,才使得广西和西南地区能够直接面对稻作农业文化,广西和四川的稻作农业文化正是在随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稻作农业出现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基本同时的,广西和西南地区稻作农业出现的最早时间还不是很清楚,但目前看来有可能稍晚一些,来源应当是长江中游地区。

五. 华南和西南早期农业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向东南亚的扩散

华南地区早期农业的出现当然不能仅仅化约为稻作农业的问题。很多研究早已经提出块茎类作物应当是华南地区最先种植的作物,但目前的发现只有甌皮岩的相关线索^⑧,无法进行讨论。旱作农业在华南地区的出现目前只有台湾大垵坑文化台南南关里遗址和广西西部感驮岩的粟作证据,南关里还有

大豆,但并没有更多的传播的线索。西南地区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西北种植粟类作物的农民进入了川西北,但在川西北的移民和传播路线目前所知还一直限于有黄土分布的区域,影响到四川盆地的时间应该在宝墩文化时期。向西南进入云南的迹象也不是很清楚。但在西藏澜沧江流域的昌都卡若发现有年代在2500BC左右的粟。长江中游也是一条线索,那里早在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已经发现有粟^⑤,但传播的路线同样不清楚。家畜在华南地区出现的时间也不清楚,虽然在邻近华南的沅水中游地区早在高庙文化中已经发现有家猪,但随后在华南地区出现的时间则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农业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一开始出现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早期稻作农业的单一体系,而是混杂有旱作农业的成分,因此很可能是以十分成熟的形态传入的,因此可以适应华南和西南多种多样的区域生态环境。这是造成此后华南和西南文化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农业文化在华南出现之后,随即在这里造成了当地文化的飞跃式发展。距今4500年开始至距今3500年左右,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黄瓜山文化^⑥,与台湾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或称细绳纹陶文化)”联系密切,应当是有新一轮移民从福建沿海渡海迁台^⑦。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所谓“印纹陶文化”,遗址数量较以前增加了数倍^⑧。以桂南地区为中心的所谓“大石铲文化”或“大龙潭类型”几乎遍布广西并在广东西部和越南北部也有发现^⑨。同时,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繁荣起来的。这一文化的繁荣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华南和西南地区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前本地区数千年采集狩猎经济下的文化发展相比,这个时期的变化无疑是大范围而快速的。其中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群的迁徙有关。华南和西南地区发生这一变化之初,正值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中期,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逐渐衰落,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人群开始大量出现在华南、西南与长江中下游交接的山地,其中粤北山地有石峡文化,粤西桂东西江流域出现了“乌骚岭类型”,这两种遗存有极大的相似性,又分别与赣鄱地区的樊城堆文化和湘江流域的岱子坪类型十分相像,很可能是后两者发展的结果^⑩,在沅水和资水上游则出现了斗篷坡文化等^⑪,这些新的文化类型都与同时期长江中

下游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南迁的证据。此后,伴随着长江中游文化的进一步衰落和解体,华南和西南地区文化开始繁荣,人口的数量应当已经超过了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同时,随南迁人群而来的多种形态的农业经济以及当地的采集狩猎经济共同支撑了华南和西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这应当从另一方面说明这里的农业不是原生型的和单一型的,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一变化发生速度如此之快的真正原因。

同时还可以加以注意的是,农业向东南亚岛屿和大陆地区传播的时间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目前证据表明,从台湾向菲律宾北部文化扩张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人口的迁徙,菲律宾出现了与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类似的陶器、石器以及矿源在台湾东部的玉器,还有稻作农业^⑫。目前在菲律宾最早的稻作证据出土于吕宋岛北部的 Andarayan 遗址,一个炭化稻谷的年代数据为2050 BC-1400 BC(AMS),另一件木炭样本的年代为1950 BC-1050 BC^⑬。距今4000年前正是南岛语族由台湾向菲律宾北部扩张的起始阶段^⑭。至于东南亚大陆地区,一般认为稻作农业的开始在距今4500到4000年之间^⑮。在越南开始大量出现稻米的年代约莫距今4000年左右^⑯,像是越南北部的冯原(Phung Nguyen)文化不但有大量的稻米证据,而且该文化还带有强烈的华南要素,包括绳纹陶、有刻划卷云纹的陶器、有肩石镑、石镞、玉环、玉玦以及陶纺轮等。泰国地区比较肯定的稻作证据也不早于距今4300年^⑰,在距今4000年以后农业聚落开始在泰国大量出现,例如位于泰国北部的 Non Nok Tha, Ban Chiang, Non Kao Noi以及泰国中部的 Ban Lum Khao^⑱。

可见,正是在4500~3500年间华南和西南地区文化发展和人口大量增长的基础上,在人口压力之下,才造成了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和大陆地区的进一步扩张。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和广西、西南地区一东一西两个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不同,农业文化的来源不同,传播的路径不同,造成东南亚岛屿与大陆此后出现的农业文化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文化新的文化底层。

六. 结 语

在目前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证据还不够充分和确切的情况下,要讨论农业和农业社会在华南的生长和发展问题,就需要从史前文化的多方面的联系中寻找更多的线索。本文并不能全面地展开这个问

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这样大的问题。上述的初步讨论只能大致看出,华南和西南的农业不是原地原生的,而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包括长江上游的西北地区传播而来的。传播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时间大致在距今 5000 年左右,传播到广西、西南地区的时间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后一个时间也许还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农业向这些地区传播的路线也并不相同,这是由这些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生态和背景、这些地区与周围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周围文化发展的情况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这些情况当然主要包括农业发展的形态以及社会发展的程度等方面。早期农业文化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还有在传播过程中重新退化为全面采集渔猎经济的可能,华南和西南邻近地区的沅水中游地区和峡江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即是一个可能的例子^⑥。只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向华南和西南地区全面推进的局面。而华南和西南地区早期农业文化迅速成熟继而向东南亚岛屿和大陆地区的迅速扩展,正说明华南和西南早期农业不是简单的原生农业,而且根据现有的资料还可以看到这些地区早期农业是包括稻作和旱作等多种成熟农作成分的。此外,在农业传播过程中似乎还包括了大量外来人口和社群的入迁。正是这样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华南和西南地区史前文化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迅速繁荣并向周围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拓展。

注释:

J. Diamond, 1988, Express train to Polynesia. Nature 336: 307~8; J. Diamond and P. Bellwood, 2003,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he first expansions. Science 300:597~603; P. Bellwood, 2005, First Farmer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a. 杨式挺:《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 年 7 期 23~28 页。b. 张文绪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作物学报》第 32 卷第 11 期 1695~1698 页,2006 年 11 月。c. 张文绪等:《石峡遗址 M104 古稻稃壳印痕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 年 02 期 20~23 页。

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毗邻原始文化的关系》,《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第 271~281 页,广东地图出版社,1998 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考古世纪回顾》,《考古》2000 年第 6 期。

朱非素:《试论石峡遗址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关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第 24~63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

香港考古学会:《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专刊》3,第 1~293 页,1978 年。《三灶岛草堂湾遗址发掘》,珠海市博物馆等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22~33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a. 邓聪等:《大湾文化试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 395~450 页,香港中文大学,1994 年。b. 裴安平:《珠江口地区咸头岭类型的序列与文化性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第 117~128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年。

Tracey Lu, Zhao Zhijun, Zheng Zhuo, The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 environments, Vegetations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t Sha Ha, Sai Kung, 康乐及文化事物署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制:《香港的远古文化—西贡沙下考古发现》,第 57~64 页,2005 年。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度香港西贡沙下遗址 C02 区和 D 02 区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4 年第 4 期。

《2006 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

⑪ a. 向安强、姚锦鸿:《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古栽培盗及相关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6 年第 1 期 33~45 页。b. 张文绪等:《广东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第 22 卷第 1 期 103~106 页,2008 年 1 月。

⑫ 严文明:《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 年第 2 期。

⑬ 水稻出土层位承发掘者陈兆善先生见告。

⑭ 陈兆善:《福建史前考古十年收获(1996~2005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八辑),第 275~283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⑮ 臧振华、李匡悌、朱正宜等:《台南科学工业园区道爷遗址未划入保存区部分抢救考古计划期末报告》,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2004 年。

⑯ 臧振华:《从台湾南科大盆坑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检讨南岛语族的起源地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八辑第337-34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⑮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69页,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0年。

⑯ 李光周:《垦丁国家公园考古调查报告》,图版8A,内政部营建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1985年。

⑰ 臧振华、李匡悌、朱正宜等:《台南科学工业园区道爷遗址未划入保存区部分抢救考古计划期末报告》,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2004年。

⑱ 黄士强:《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第55页,台北文献委员会,1984年。

⑲ 赵金勇:《台东县长滨乡长光遗址发掘报告》,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

⑳ 赵志军:《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第145~15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㉑ 赵志军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考古》2005年第11期。

㉒、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㉔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县岜旺、弄山岩洞葬发掘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第206~23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㉕ 韦江:《广西先秦考古述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第48~59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㉖ 李珍、杨轲:《广西武鸣弄山、岜旺岩洞葬的发掘与研究——兼论桂中南早期岩洞葬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第421~43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㉗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3期。

㉘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那坡县博物馆:《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0期。

㉙ 陈剑:《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㉚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㉛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

㉜ 肖明华:《云南考古述略》,《考古》2001年第12期。

㉝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㉞、㉟ 张弛、洪晓纯:《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第415~43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㊲、㊳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㊴ 阮文好编:《越南的多笔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第341~34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㊵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横县秋江贝丘遗址的发掘》,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2辑),第144~18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㊶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横县江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期。

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象州南沙湾贝丘遗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176~19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㊸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封开县博物馆:《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㊹ a. 裴安平:《珠江口地区咸头岭类型的序列与文化性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第117~12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b. 卜工:《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99年第11期。

㊺ 陈有贝:《广东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差异——兼论台湾史前史的相关问题》,《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57:64~86,2001年。 Tsang C-H 2005 Some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ustronesian Expansion 2005年 Lapita 圆桌会议论文 (2005.6.5~6.). 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考古学专题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

④⑦ 刘益昌、郭素秋:《金门复国墩遗存在亚洲大陆东南沿海的地位及其意义》,陈仲玉、潘建国主编《中国东南沿海岛屿考古学研讨会》,第135~195页,连江县政府文化局,2005年。

④⑧ 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影响与传播》,《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④⑨ 西谷大:《中国东南沿海部の新石器时代》,《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报告》(第70集)第1~56页,1997年。

⑤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第286~294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⑪ 那须浩郎、百原新、安田喜宪:《试从大型植物遗存看城头山遗址的稻作环境——以杂草种子、果实为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第90~9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⑤⑫ 林公务:《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福建文博》2005年第4期。

⑤⑬ K.C.Chang,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73; Tianlong Jiao, Prehistoric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集,第15~3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⑤⑭ 赵辉:《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册),第230~25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⑤⑮ 陈远璋:《桂南大龙潭类型遗址初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地区史前考

古》,第409~42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⑤⑯、⑤⑰ 贺刚:《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第183~193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⑤⑱ 洪晓纯:《台湾及其邻近岛屿的史前文化关系——兼论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中国东南沿海岛屿考古学研讨会”论文,2005年11月,马祖。

⑤⑲ B.E. Snow, R. Shutler, D.E. Nelson, J.S. Vogel and J.R. Southon, 1986. Evidence of early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4: 3~11.

⑥⑩ H.C. Hung, 2005, Neolithic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The Pottery and Jade Evidences from the Cagayan Valley.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109~133.

⑥⑪ C. Higham 2003, Language and farming dispersals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and rice cultivation In P. Bellwood and C. Renfrew eds, Examining the Language/Farming Dispersal Hypothesis pp223~232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⑥⑫ P. Bellwood, 2005, First Farmers, pp.131~13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⑥⑬ I. G. Glover and C.F. Higham, 1996, New evidence for early rice cultivation. In D. Harris ed,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pp.412~41. London: UCL Press.

⑥⑭ C. Higham, 2004,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In I. Glover and P. Bellwood eds., 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pp. 41~67.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上接第74页)

Liu, L. G.-A. Lee, L. Jiang and J. Zhang 2007 "Evidence for the Early Beginning (c. 9000 cal. BP) of Rice Domestication in China: a Response." The Holocene Vol. 17: 1059~1068.

Lu, Tracey L-D 1999 The Transition 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Oxford: Archaeopres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o. 774.

2006 "The Origin of Cereal Cultivation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Vol. 45(2): 129~158.

Vaughan, D.A, B. R. Lu and N. Tomooka

2008 "The Evolving Story of Rice Evolution", Plant Science Vol. 174: 394~408.

王象坤、孙传清、张居中:《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⑦⑪ Zhao, Z.J, D. M. Pearsall, R. A. Benfer Jr. and D. R. Piperno 1998 "Distinguishing rice (Oryza sativa poaceae) from wild Oryza species through phytolith analysis, II: Finalized method". Economic Botany Vol. 52(2): 134~145.

⑦⑫ 郑云飞:《河姆渡文化稻作农耕遗迹研究》,2008年,在“田螺山遗址的稻作农耕”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